

世间已无李泽厚

□ 马延君

著名华人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逝世。他在睡眠中走得安详,享年91岁。

李泽厚生于1930年,湖南宁乡人,在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美学热”中,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,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。

作家易中天曾发文称:“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、学者不同,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‘思想家’。他拥有的财富不是‘知识’而是‘智慧’,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‘治学’而是‘思考’。”

贯穿李泽厚一生的不仅有赞美之词,痛苦、批判、争议也始终相伴而行。

打开了一座“美学的门”

消息是突然传来的,11月3日早上,接到海外友人发来的信息,作家张曼菱愣在了原地——“李泽厚去世了。”

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,张曼菱与李泽厚有过数面之缘。1982年,李泽厚最为人知的作品《美的历程》出版,以精妙的文字梳理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、艺术文化,从远古时期的“龙飞凤舞”写到魏晋风度、唐宋佛像,又写到明清小说戏曲,一时间风靡高校。

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断层,突然看到有人文采飞扬地书写历史哲学,释放对美的追求,让张曼菱有种“久别重逢”的快感。她捧着书一口气读完了全本,“我看完还觉不过瘾,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寄给李泽厚,说他明清时期写得太多,文字也洋洋自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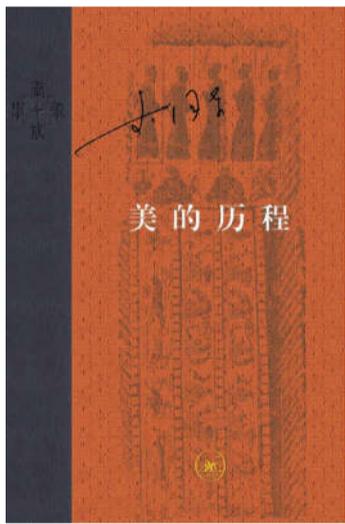
让张曼菱没想到的是,已是知名学者的李泽厚并未轻视一封大学生的来信,而是回信邀她当面详聊。“他和我讨论一番,承认自己对《美的历程》也不是很满意,受篇幅制约,文章有所删节。”

“后来我又写信邀他与同学跳舞,和北大哲学系同学讨论,他每次都是乘兴而来,从不讲年龄、辈分、名气。”在张曼菱的记忆中,那是一段万事万物都生机勃勃的时光,她和同学们不断吸收着涌来的新鲜知识,李泽厚替他们打

开了一座“美学的门”。

看到李泽厚离世的,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正经过天安门,“一瞬间眼泪就掉下来了”。他还记得2017年深秋,李泽厚最后一次回国,他们一同游览了北海公园,李泽厚兴致很高,又主动要求前往天安门,“当时李泽厚给了我一份他在海外的访谈,他在访谈里说,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。”

作家易中天在《盘点李泽厚》一文中曾提到,“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,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,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,发表新见解,提出新问题,阐述新观点。”



“英雄也造时势”

李泽厚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,早在12岁时,他便想过“人总是要死的,活着为什么?”他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是“孤独、清醒、感伤的。”不合年龄的痛苦思考或许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,李泽厚1930年6月出生,成长在湖南长沙宁乡县,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,英语很好,但在他12岁时不幸病逝。

贫穷是贯穿李泽厚青少年时期的底色,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,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长大,勉强供养二人上学。李泽厚回忆家道中落,春节时亲戚家大鱼大肉,热闹非凡,母子三人则冷冷清清,相依为命,高中时为了看到进步书籍,只能在每星期天过河,饿着肚子去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一整天。

他在自述中写道: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。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,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,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、认真、广泛阅读的青年时

期。”

194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,李泽厚挨过了失学、失业,成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日子,直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,贫穷的生活也并未远离。李泽厚记得“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,有时连牙膏也不买,用盐刷牙,把几元生活补助费积存下来,寄给正在上中学,父母双亡的堂妹。”得了肺结核后,一些活动不能参加,他便独自住在宿舍楼顶上的“阁楼”里读书、写作,北大丰富的藏书滋养了他的眼界,也让他的哲学研究渐成体系。

1955年,25岁的李泽厚发表了《论康有为的〈大同书〉》《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》等文章,一举成名。此后,他并未为钱忧愁,“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,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,我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文章,稿费加起来1000元,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元还是70元,反正很少。”

钱财的宽裕让李泽厚有了底

气,他买了一个电动唱片机,在当时还是奢侈品,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。“在新加坡,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,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。”更重要的是,“50年代就定了,不为政治任务,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。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李泽厚接连出版了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美的历程》,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论述立刻引起青年人的呼应。那时,他的书能够卖到几十万册,连工厂女工都会挤到书店抢购,李泽厚也因此一跃成为本土学术明星。

在前同事的回忆中,“只要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,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。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。中午去食堂吃饭,他后面跟着二三十人的队伍,浩浩荡荡。”

多年后的采访中,再次提及当年的盛况,李泽厚表示,是因为那时的“美学热”刚好符合了社

1992年,李泽厚远赴美国小镇教书,此后国内对其讨论声减弱,舆论场上再起波澜却是因为三年前写给金庸的一篇悼文。

文中称金庸得知他出国后情况不稳定,赠其六千美元,“这当然是好意,但我心想如此巨人,出手为何如此小气,我既应约登门拜访,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,于是婉言而坚决地谢绝了。”

后来,李泽厚在一次采访中解释,事情原委为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元,没用完,退回六千美元,于是便想将六千美元赠予他,但他认为这更像施舍,不想背上人情债。”

这在李泽厚的人际交往中

早年间,几乎所有见过李泽厚的来访者都会表示“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”,“完全看不出上了年纪”。读者杨斌与他第一次通话时,下意识地说了句:“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,跟年龄不相称。”逗笑了李泽厚,两人就这么熟悉起来,成了多年好友。

好友杜欣欣在《李泽厚隐居在落基山中的日子》中回忆,当时74岁的李泽厚开车速度依旧飞快,“我在平路上开车时,李先生总在睡觉。一开上山路,他就醒了,然后要求开车,他的理由是担心开车技艺会丧失。他请求了几次,我磨不过,只好让他开。不幸的是邻近拉斯维加斯,有一段很弯曲的山路。他开得很辛苦,我们坐得也很辛苦。”

杜欣欣问:“怎么你每次都



会思潮,也是促进社会苏醒的符号,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了,“文革”之后,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,对到底什么是美,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。“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。”

但仅因一时之势,终究难成就当年的美学之盛。对此,易中天曾评价:“李泽厚是极为敏感的。他总是能把握住思

猎者:至真至诚

并非孤例,此前他还在给学生赵士林的序言中直言:“这本书是他瞒着我写的。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,也不对本书负责任。”并称“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个序,正好趁此写这几句说明一下。”

对于自己的不通人情世故,李泽厚曾解释为:“我的经历相当简单,但生活波折仍然不少。尽管已发表不少文章,但环境压力颇大,非议很多,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很大,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。”

“但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学会了使思想尽量不受外来影响。我坚守自己的信念,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

想文化的历史脉搏,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。八十年代的‘美学热’、‘文化热’便都与李泽厚有关。几乎可以说,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,哪里就会热起来。”

于是当记者问李泽厚:“你把它解释为时代的关系,所谓时势造英雄吗?”李泽厚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英雄也造时势”。

路。要自己掌握人生的价值,树立自己内在的人格价值观念。毁誉无动于衷,荣辱在所不计。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了。”

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,他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》,十几万的版税,李泽厚要赠予他,他坚决不要。近几年,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。因为“年纪大了,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。”

对于自己一生的跌宕起伏,人言评判,李泽厚自认“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,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,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猎者罢了。好些人以为我很狂,其实错了。”

美的历程无尽头

赶上不好开的路呢?”李泽厚答非所问地回道:“我这一辈子都是运气不好。”

步入耄耋之年,不断梳理作品,总结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了李泽厚的主要工作,每当编辑发来书稿,必定逐页审读,在修改处细心折角贴条来做提示。他承认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阅读自己的作品,“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,希望多些人看,了解得更多一些。”

但他也说不抱奢望,“愿意看的就看,这不是我能左右的。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、专业化,很多人根本不会看,很难强求。不可能、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。”

只是近几年,时间终是追上了李泽厚。依赖安眠药入睡,安装心脏起搏器,又摔伤了腰椎。

在和马群林的对谈中,李泽厚提到自己已经老了,做不了很多事了,两只眼睛分别患了青光眼和黄斑裂孔,看书都坚持不了半小时。

他对生死并不避讳,八十岁接受采访时,李泽厚说道:“有的人为名为利活,有的人为儿女活,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。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,为人类活,所以我有本书叫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》。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,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。”

人生的最后阶段,李泽厚时常远眺窗外,目之所及是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,而他的离世终究引起了众人的自发悼念——“人的一生成有时辰,美的历程无尽头。”

(选载自《新京报》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南方人物周刊》)